

· 经济观察·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

“内卷式”竞争的成因、运行机制与治理路径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竞争理论的分析

周文¹, 钟锦宸^{1, 2}

(1.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院, 上海 200433; 2.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内卷式”竞争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其典型表现为企业间的市场竞争持续加剧, 却未有效推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竞争理论认为,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 竞争是调节社会总劳动在各生产部门间配置的重要机制, 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具有促进生产力或抑制生产力的作用。“内卷式”竞争是创新驱动发展转型进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它并非单纯由竞争强度上升所致, 而是在资本积累约束条件下, 竞争的重心从价值创造转向价值实现, 导致其丧失引导社会总劳动向创新领域配置的功能, 变为系统性同质化竞争。“内卷式”竞争一旦形成, 便会通过总量与结构循环、短期与长期叠加、国内与国际交织三重机制实现自我强化。因此, 需要塑造基于创新能力的竞争优势, 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三个维度系统施策, 为创新型竞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完善的调节机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推动竞争模式从存量争夺转向增量创造, 构建“阶梯状、错位式”的创新型竞争格局, 从而有效破解“内卷式”竞争。

关键词:“内卷式”竞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竞争理论; 资本积累; 价值实现

中图分类号: F124; F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26)03-0003-14

一、问题的提出

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机制。近年来, “内卷式”竞争成为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一个广受关注的现象。在多个行业和领域中, 企业间的市场竞争持续加剧, 却未有效推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反而表现为“价格战”频发、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创新投入意愿下降等特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传统制造业或低端产业, 而且在新能源、半导体、高端装备等技术密集型领域逐步显现, 呈现高中低端产业同步“内卷”的态势。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 “内卷式”竞争表明市场规模尚未有效转化为创新回报和结构升级动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收稿日期: 2026-01-24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重点任务研究”(23ZDA03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来源与重要特征研究”(2024JZDZ005)

作者简介: 周文(1966-), 男, 重庆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E-mail: zhou59201@163.com
钟锦宸(2000-), 男, 福建龙岩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E-mail: 24210010051@m.fudan.edu.cn

指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2]。综合施策、有效治理“内卷式”竞争已成为“十五五”时期推动国内市场“由大变强”的迫切任务。从表面上看，“内卷式”竞争似乎是竞争强度的上升，但其核心症结却是竞争方式的同质化和竞争结果的低效率。由于难以通过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构建竞争优势，市场主体被迫在有限的市场容量中陷入低价博弈，而非致力于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这种行为不仅未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反而加剧了产能相对过剩。

围绕“内卷式”竞争问题，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研究从产业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出发，着重分析竞争强度、市场结构和资源配置效率，通常将“内卷式”竞争理解为过度竞争或市场失灵的表现，主张通过反垄断、规范市场秩序等方式加以治理^[3-4]。该视角在分析竞争形式和市场行为方面较为成熟，但其理论前提通常预设竞争具有普遍的效率提升作用，因而难以解释竞争在特定阶段转化为低效率形态的内在机制。第二类研究从创新视角展开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技术突破乏力是“内卷”产生的重要原因^[5]。这类研究虽然揭示了创新与竞争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多局限于微观或中观层面，较少将创新困境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察，因而难以解释创新不足为什么在多个产业和层面同时出现。第三类研究尝试从制度和政策层面解释“内卷”现象，关注地方政府竞争、要素市场分割、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对国内竞争格局的影响^[6-8]。这类研究拓宽了该领域的研究视野，但往往侧重于对外在约束条件的分析，缺乏对竞争内在运行逻辑的系统刻画。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在揭示“内卷式”竞争的表现形式和成因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仍需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竞争为什么在特定发展阶段未能发挥促进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反而转化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地，对竞争在特定阶段呈现系统性同质化特征的内在机制，尚未形成有效的分析框架。从历史来看，竞争形态总是处于动态演化之中：供不应求阶段的竞争不充分和供大于求阶段的竞争过度，都会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而调整。西方产业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实践。尽管学术界存在不同学派，且各学派核心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如对市场结构或市场行为的分析，但其核心议题始终聚焦于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旨在提升市场绩效的公共政策设计。然而，西方产业经济学通常仅关注特定产业内部的垄断与竞争问题，对产业间的资源配置关系则较少涉及^[9]。究其实质，“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10]⁹⁵当前，中国“内卷式”竞争的形成与演化深度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单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难以有效回应这一重大现实问题。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竞争理论出发，将“内卷式”竞争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察。与将竞争简单理解为市场行为或制度偏差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竞争视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调节社会总劳动在各生产部门间配置的重要机制，并强调竞争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具有促进生产力或抑制生产力的作用。实际上，“内卷式”竞争是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其实质是在资本有机构成普遍提高、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受限的条件下，竞争的重心从价值创造转向价值实现。具体而言，“内卷式”竞争具有系统性和同质化两个核心特征。一方面，系统性体现在竞争失序并非局部现象，而是贯穿于产业资本循环的全过程，从生产领域的产能扩张到流通领域的“价格战”，再到分配领域的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同质化根源于社会总劳动在创新领域与非创新领域之间的配置失衡，加之资本流动面临壁垒，阻碍了部门间利润率平均化机制的实现，致使经济陷入盲目扩张、重复建设、无效投资的存量争夺困境。据此，本文提出，破局“内卷式”竞争的关键在于塑造基于创新能力的竞争优势，形成“阶梯状、错位式”的竞争格局，推动竞争从同质化的价格竞争转向差异化的创新竞争，以期为

促进“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竞争理论的当代启示：一个分析框架

竞争规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竞争理论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之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1]。①马克思高度重视竞争问题，在制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时，打算在《资本》册的《资本一般》篇之后专门研究竞争学说^[12]。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竞争理论出发，竞争并非单纯的市场现象或企业行为，而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总劳动配置的调节机制。竞争既是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制力量，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演变为破坏性的、低效率的竞争形态。“内卷式”竞争正是竞争从推动生产力发展转向制约生产力提升的具体表现。

（一）竞争的一般规定：社会总劳动配置的调节机制

从根本来看，竞争是资本在追求更高利润率和积累过程中相互作用的表现，其功能在于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不同生产条件间的流动，对社会总劳动的配置结构进行调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竞争成为连接个别资本行为与社会整体再生产过程的重要机制。

竞争对社会总劳动配置的调节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部门内部，不同企业的生产条件存在差异，生产同种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各不相同。在同种商品生产者间的竞争中，“不同的个别价值，必须平均化为一个社会价值，即上述市场价值”^{[13] 201}，这一过程确立了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价格围绕市场价值波动，调节商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趋向平衡，促使生产条件落后的企业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在部门间，社会总劳动需要按一定比例配置于各个生产领域。“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竞争，同供求比例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归结到这个标准上来。”^{[13] 214}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总劳动“究竟按怎样的量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分配？竞争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同样它也不断地瓦解这种分配”^[14]。具体而言，如果某部门投入的社会劳动时间高于社会需要的比例，商品价格将低于价值，利润率下降，资本会退出该部门；反之，如果某部门投入的社会劳动时间低于社会需要的比例，商品价格将高于价值，利润率上升，则会吸引资本流入。

竞争调节社会总劳动配置的有效性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技术进步能够持续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资本相对自由地在部门间流动时，竞争便能够较好地发挥配置社会总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当资本有机构成普遍提高、有效需求增长滞后于生产能力扩张时，竞争的调节功能就会发生扭曲。由于资本难以通过部门间流动实现利润率平均化，竞争则可能演化为低效率甚至破坏性的形态。因此，竞争本身并不存在先验的效率属性，其经济后果取决于竞争能否实现社会总劳动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合理配置。这一判断为理解“内卷式”竞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内卷”并非简单的竞争过多或竞争不足的问题，而是竞争在特定条件下未能有效完成社会总劳动配置功能的结果。当竞争不再主要关注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新的社会需要，而是集中于既有市场空间的争夺时，“内卷式”竞争的特征便随之显现。

（二）竞争的双重性：促进生产力与抑制生产力

“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15]竞争既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破坏性的经济机制。

①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来看，竞争既可以指广义上个体间的比较与竞赛，也可以指发生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具有明确社会经济内涵的经济竞争。后者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前提，表现为商品生产者或劳动者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竞争，并深刻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演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分析的正是这种经济竞争，本文亦在这一意义上展开讨论。

竞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竞争通过部门内部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形成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强制机制。“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10] 180}。在同一生产领域,不同资本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必须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竞争在同一生产领域所起的作用是:使这一领域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这个领域中平均需要的劳动时间”^{[16] 230}。其二,竞争推动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间流动,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竞争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所起的作用是:把不同的市场价值平均化为代表不同于实际市场价值的费用价格的市场价格,从而在不同领域确立同一的一般利润率。”^{[16] 230}资本在利润率差异引导下跨部门流动,推动社会资源向技术创新领域集聚。其三,竞争推动产品创新和新兴生产部门形成。商品生产者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因和应对竞争的外在压力,推动了产品创新、部门创新和社会分工体系的扩展。在这一意义上,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17]。

然而,竞争并非始终具有正向作用。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阶段,生产条件和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竞争也可能对利润形成和再生产条件产生破坏性影响。当投资扩张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技术创新不足以持续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资本有机构成普遍提高导致利润率趋于下降时,竞争可能迫使资本采取压低价格、极限压缩成本乃至盲目扩大产量等方式维持生存。正如马克思所言,“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13] 996}。然而,在上述条件下,这一调节机制趋于失效。

竞争的双重性表明,其形态会随着资本积累阶段和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资本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只有通过资本间的竞争互动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运行状态,但其具体方式和经济后果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阶段性特征。当技术进步能够持续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时,竞争的正向效应占主导,其结果是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当这些条件不再具备时,竞争的负向效应占主导,则会加剧资源浪费和无效扩张。“内卷式”竞争是竞争在特定发展阶段、特定积累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是竞争的破坏性方面压倒其进步性方面的结果。

(三) 竞争的阶段性转化: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

在资本积累的不同阶段,竞争所围绕的核心内容会发生相应转化。马克思指出:“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同一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18] 370-371}然而,这一机制在不同积累阶段的运行方式及其经济后果存在显著差异。

在积累条件相对顺畅的阶段,竞争主要围绕价值创造展开。“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18] 371}在竞争压力作用下,生产主体不断革新生产方式,推动部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竞争的外部强制”^{[18] 400}。围绕价值创造展开的竞争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需求空间。生产的发展使投入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18] 683}。然而,在积累条件相对受阻的阶段,当资本有机构成普遍提高时,积累过程的内在约束逐渐显现。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比重上升,利润率面临下降压力。同时,当某一生产部门投入的社会劳动总量超出社会需要的比例时,新增投资不再必然带来相应的需求扩展,价值实现压力显著上升,竞争的重心从价值创造转向价值实现。

竞争通常通过资本在不同生产领域间的流动来实现利润率的平均化。“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13] 201}当多数部门同时面临价值实现困难、市场容量受限时,为出售商品、维持现金流和利润空间,生产主体不得不在有限的市场中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马克思曾深刻剖析过这种竞争形态的转变:“除了繁荣时期以

外, 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 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份额。这个份额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18] 522 随着价值实现压力不断上升, 竞争往往通过压低价格、削减成本和扩大产量等方式展开。正是在这一阶段性转化中, “内卷式”竞争逐渐形成。这种竞争虽然在短期有助于个别生产主体维持生存, 但在宏观层面却会进一步压低利润率、抑制再投资和创新投入, 从而强化竞争的负面效应。

三、“内卷式”竞争的成因：资本积累约束下的系统性同质化竞争

马克思批判了将资本积累归结为“节欲”的观点, 强调资本积累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19], 这是理解竞争的关键。当前, 资本积累约束并非指资本数量不足或经济增长停滞, 而是指在既定技术路径和生产组织方式下, 资本扩张难以持续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 投资扩张难以转化为稳定的利润率提升, 这使得竞争逐步转向对既有市场空间的存量争夺。“内卷式”竞争正是资本积累条件发生变化后竞争形态转变的结果。该转化过程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 一是资本积累条件发生变化, 促使竞争的重心从价值创造转向价值实现, 奠定了“内卷式”竞争的宏观基础; 二是创新能力内生性弱化, 导致企业竞争策略趋同, 形成了系统性同质化竞争格局; 三是资本流动受阻和利润率平均化机制失灵, 致使竞争难以通过市场调节实现自我纠偏, 从而被锁定在存量争夺中。

(一) 资本积累条件变化与生产可能性边界受限

在经济发展早期或技术进步较快的阶段, 资本积累通常能够通过引入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 持续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 为竞争提供充足的增量空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经济实践表明, 在技术后发和资本相对稀缺的条件下, 大规模的物质资本积累有助于迅速提升生产能力。作为技术后发国家, 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初期, 必须通过“投资于物”的方式形成规模效应, 尽快缩小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此过程中, 资本积累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正向关系: 大规模资本投入为技术引进、设备更新和生产组织方式改进提供了物质基础, 劳动生产率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维持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20], 进而增强了资本扩张的动力, 使经济增长呈现投资、需求和利润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在上述条件下, 资本积累能够持续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 竞争主要围绕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展开, 表现为推动结构升级和产业发展的积极力量。

然而, 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 上述机制逐渐发生变化。其一, 资本有机构成普遍提高, 导致既定技术范式下不变资本占比不断上升, 资本生产率呈现长期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起, 单位资本的产出效率和整体投资回报水平持续走低。2008—2019年, 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维持在70%左右, 但实际GDP增长率却呈现回落态势; 2014—2019年, 物质资本年均增长率明显下降^[21]。如果资本积累的效率问题得不到有效缓解, 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最终将对利润形成和再生产条件构成约束。其二, 技术水平逐步逼近国际前沿, 致使技术引进和模仿的空间不断收窄, 自主创新面临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 1991—2007年,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37.5%, 2008—2019年,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下降至15.8%^[22]。技术进步对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推动作用开始减弱, 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率显著下降。其三, 需求侧约束日益显现。虽然劳动生产率提高在短期有利于增加利润和扩大投资, 但如果收入分配结构未能同步优化, 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将抑制消费需求, 导致有效需求增长滞后。2014—2019年, 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至9.28%, 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7.78%, 同样处于历史较低水平^[21]。

在此条件下, 资本积累开始面临内在约束, 其继续扩张不再主要受制于技术可行性, 而更多受制于价值实现条件。新增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难以顺利实现价值, 生产扩张速度整体上开始快于

市场容量扩张速度。当社会总劳动的配置结构逐渐偏离社会需求结构时,尽管生产可能性边界在物理维度仍有扩张空间,但其在价值实现层面的有效边界却未能同步拓展。这种错位导致资本积累难以为竞争提供持续的增量空间。由此可见,在技术创新不足、市场需求扩张趋于放缓的双重约束下,企业难以凭借技术优势或市场开拓实现差异化发展,被迫在既有生产可能性边界内展开竞争。竞争的重心从价值创造转向价值实现,从而为“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 创新能力不足与同质化竞争

在上述资本积累约束条件下,企业难以通过创新开辟新的增量空间,其竞争策略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创新能力不是单一技术突破能力,而是经济主体通过技术进步、组织优化和制度创新,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的综合能力。在资本积累约束逐步显现的条件下,创新能力内生弱化成为引发同质化竞争的关键因素。从技术水平来看,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虽位居全球第10位,但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和基础研究深度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从专利数据来看,自2019年起,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递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但高价值专利仍由美国和日本主导,中国呈现“数量领先、质量不足”的特征^[23]。尽管创新活动数量快速扩张,但颠覆式创新的突破能力依然不足,难以打破既有技术范式,进而无法创造充足的增量空间。

一方面,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企业难以形成稳定的技术优势。在既定技术范式下,企业长期依赖技术引进和模仿。然而,此类后发优势空间日益收窄,自主创新则面临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当企业无法通过颠覆式创新突破现有技术路径时,不同企业在技术路线、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上呈现高度相似的特征。这使得企业难以依靠技术优势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只能在相似的技术水平上展开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不足制约了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即便部分企业在某些领域实现了技术突破,但由于创新成果转化效率较低、产业化能力不足,技术优势难以迅速转化为市场优势和利润增长。因此,企业难以通过技术创新获得足够的超额利润,致使创新激励机制弱化。相比较而言,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压低价格、削减成本和扩大产量等见效快、风险低的竞争策略,而非加大研发投入和开展技术创新。

在资本积累约束条件下,创新资源配置进一步失衡。由于利润率下降和价值实现困难,企业可用于研发的资金减少。同时,创新活动本身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在经营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将有限资源投向短期见效的项目,而非颠覆性创新项目^[24]。这导致创新活动的数量虽有增长,但质量和突破性不足。企业间竞争方式的选择也受到显著影响。当创新能力不足以形成稳定的竞争优势时,企业难以依靠技术进步、产品升级或模式创新来提高利润率,只能转而采用压低价格、消减成本和扩大产量等方式维持市场地位。此类竞争策略虽然在个体层面具有短期合理性,但在整体层面却会加剧同质化竞争。同质化竞争不仅难以改善整体利润状况,反而会通过相互压价不断侵蚀利润空间,使企业用于研发和长期投资的资源进一步减少。由此,创新能力不足与同质化竞争之间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一旦该循环在多个行业和领域同时出现,“内卷式”竞争便从局部现象演变为系统性问题,竞争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积极作用也将受到抑制。

(三) 资本流动受阻与利润率平均化受限

同质化竞争的形成揭示了“内卷式”竞争的症结所在,但要理解其为何难以通过市场出清自行纠正,还需进一步考察资本流动受阻问题。理论上,竞争会推动资本在不同部门和地区间流动,实现利润率的趋同,引导社会总劳动在不同生产领域间合理配置。“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13] 177}。各部门利润率趋同的形成机制,本质上是资本通过跨部门竞争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本持续从低回报领域转向高回报领域,推动各领域规模此消彼长,最终实现各部门收益水平的

均衡化。正是得益于部门间的这种竞争与调节机制，社会各生产领域方能吸引资本进入，其产出才能覆盖多元化社会需要，从而保障社会再生产的延续性。然而，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资本流动的灵活性受多重因素制约，进一步加剧了存量竞争的压力。

一方面，行业准入壁垒、地方保护和要素市场分割，限制了资本在不同部门和地区间的有效流动。部分行业存在较高的准入门槛，新资本难以进入；地方保护主义导致资本在区域间流动面临隐性障碍；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分割状态，使得资本难以按照利润率信号自由配置。这些制度性障碍使利润率差异难以通过竞争机制得到充分调节，部门间利润率的分化趋势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在资本有机构成普遍较高、固定资本占比较大的条件下，资本退出成本显著上升。随着生产技术方式的演进，企业固定资本投入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周转速度相应下降。当某些领域利润率持续下降时，由于固定资本已经沉淀在特定生产部门，退出或转型意味着巨大的沉没成本。即使其他领域有更高的利润率，企业也难以及时转移资本。

生产组织方式变化和资本流动机制错配加剧了利润率平均化的困难。资本流通过程是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决定企业竞争能力的包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马克思指出：“完全撇开资本a的生产过程不谈，资本b的生产过程的速度和连续性是决定资本a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产业资本形式的要素。”^[25]这一论断揭示了资本循环的相互依存性。当前，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互为前提，形成了高度依赖的生产网络。单个资本的流动不仅需要考虑自身的利润率，还需要考虑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26]。随着利润率平均化机制受阻，竞争难以通过资本重新配置缓解过剩问题，反而容易演化为在既有领域的重复、无效扩张。企业在无法退出或转型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扩大规模、争夺市场份额的方式维持利润水平，导致产能不断堆积。“竞争不创造利润。利润的水平，在平均化过程发生的时候便形成了。竞争不过使它提高或降低，但并不创造它。”^{[13] 979}这意味着当竞争无法推动资本在部门间合理流动时，部门内竞争便失去了优化配置社会总劳动的功能，转而演变为围绕既有市场空间的零和博弈。

四、“内卷式”竞争的运行机制：创新缺失与竞争失序的自强化循环

“内卷式”竞争一旦形成，便会通过多重机制实现自我强化，使竞争难以通过市场调节回归正常轨道。这种自我强化并非源于单一环节的失灵，而是贯穿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系统性循环。从社会总劳动配置维度看，产能相对过剩引发“价格战”，进而压缩利润空间并削弱创新投入；创新投入不足导致技术路线趋同，反过来又加剧产能过剩，最终形成总量与结构失衡的自我强化循环。从要素配置来看，价格扭曲和市场分割在短期造成利润率信号失真，在长期造成资源配置固化，短期利润率信号失真与长期资源配置固化相互叠加，使利润率平均化机制失灵。从国内外循环来看，国内产能过剩推动企业转向出口，却在遭遇贸易壁垒后被迫回流，进一步加剧国内竞争；这种国内外循环的阻滞与脱节，显著压缩了突破“内卷式”竞争的空间。上述三重机制相互作用，形成了创新缺失与竞争失序的恶性循环。

（一）总量与结构循环机制：社会总劳动配置比例偏离创新驱动要求

总量与结构循环机制是指社会总劳动在创新领域与非创新领域之间的配置比例失衡，通过产能扩张、价格竞争、利润侵蚀、创新削弱等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过程。这一循环机制源于投资潮涌引致的产能扩张。在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当新兴业态被视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时，由于市场供求的价格信号模糊，地方政府、企业往往会一哄而上，形成投资潮涌现象。许多省份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行业列为主导产业，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竞相提供不符合当地实际的优惠条件。个别县市的开发区负债占全市或全县总负债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27]。这种投资模式使大量社会总劳动被配置到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的过度进入造成“扩张即过剩”问题。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均值为75.3%，较2021年高点下降4.5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明显放缓^[28]。

产能过剩引发供需失衡，进而引发“价格战”和利润压缩，形成循环的第二阶段。当生产能力显著超越市场容量扩张时，企业为求生存，只能通过降价争夺市场。生产端价格承压明显，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哪怕利润已经被压缩甚至出现亏损，部分企业依然坚持维持或扩大产能，原因在于竞争的淘汰性：一旦停止投入，往往意味着最先出局。企业经营压力引发了广泛的连锁反应。一方面，A股上市公司营销费用占比持续上升，下游行业“价格战”频发。另一方面，头部企业为争夺国内存量市场竞相降价，并将压力沿产业链层层传导，通过向供应商压价、延长账期等方式，压缩了中小制造企业的利润空间。这一过程形成了“总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市场疲弱、家庭消费受限”的负向循环反馈。“价格战”和利润压缩直接削弱了企业的创新投入能力，研发活动呈现短期化倾向，表现出对基础性创新的风险规避倾向，并将重心转向成熟技术路线的渐进式优化。

创新不足引致技术锁定，加剧同质化竞争，进而固化这一恶性循环并开启新一轮演化。当整个行业处于相近的技术层级时，企业往往会陷入同质化竞争的困境，产品趋于雷同，既难以形成特色优势，也缺乏自主定价的空间，只能依靠“价格战”争夺市场份额。一方面，企业为分摊沉没成本，被迫持续扩大产能规模。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其新建产能在加速旧设施淘汰的同时，往往也推高了行业整体产能水平。资本投入具有周期性和滞后性特征，随着新发展模式取代旧发展模式，前期形成的固定资本存量难以及时适应供求结构的动态演变，从而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29]。这一循环使社会总劳动在创新领域与非创新领域之间的配置比例持续失衡，“内卷式”竞争从局部现象加速演变为系统性问题。

（二）短期与长期叠加机制：产业资本因市场分割无法实现平均利润

短期与长期叠加机制是指要素价格扭曲在短期造成利润率信号失真，市场分割在长期造成资源配置固化，两种矛盾相互叠加，使利润率平均化持续受阻的过程。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在地方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模式下，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往往偏离其真实价值。为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竞相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导致要素价格无法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配置效率。这种价格扭曲使资本流动的利润率信号失真，资本不再按照利润率高低进行配置，而是流向政策优惠力度大的地区和行业。简言之，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30]。

市场分割在长期造成资源配置固化，这与要素价格扭曲在短期造成利润率信号失真相互叠加，形成了更为顽固的锁定效应。行政分权改革形成“行政区经济”现象，该现象本质上是地方政府以行政权力嵌入市场运行^[31]。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活动，如制定优先采购本地产品、设置隐性准入门槛等维护地方利益的政策，这阻碍了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顺畅流动。虽然2024年全国累计清理废止涉及地方保护的政策文件12.7万件，但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部分地区，审查豁免条款比例仍然较高，导致市场准入壁垒难以完全破除^[32]。短期利润率信号失真使资本在当期无法按照真实的利润率进行配置，大量资本流入产能过剩领域，进一步压低了这些领域的利润率。长期市场分割则使这些错配的资本难以退出，在资本有机构成普遍较高、固定资本占比较大的情况下，资本退出成本显著上升，形成资本被锁定的状态。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脱节推高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强化了上述叠加效应。

短期与长期矛盾的叠加，致使利润率平均化机制失效，竞争被锁定在既有领域。马克思指出：“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会进行得更快：1. 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 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13] 218}然而，在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分割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都受到较大制约。

企业难以通过退出低利润率部门、进入高利润率部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被迫在既有领域内依托“价格战”、规模扩张等方式争夺存量市场。这种竞争不仅无法提高整体利润率,反而因相互压价不断侵蚀利润空间,使企业用于长期投资和技术创新的资源进一步减少。短期利润率信号失真与长期资源配置固化相互叠加,使利润率平均化持续受阻,进而导致“内卷式”竞争不仅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自我纠偏,反而陷入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三) 国内与国际交织机制: 贸易壁垒与技术封锁加剧国内竞争压力

国内与国际交织机制是指国内产能过剩与国际市场壁垒、国内技术升级需求与国际技术封锁相互交织,使“内卷式”竞争在双重约束下不断强化的过程。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竞争的范围也从国内拓展到国际。马克思指出:“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13]²⁶⁴资本流通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而流通环节的控制权决定了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在全球价值链中,跨国采购商通过掌控流通环节,割裂了中国制造企业与国际终端市场的直接联系,使代工企业既丧失了对国外市场的控制权,也失去了国内市场的主动权。当企业试图通过出口缓解国内竞争压力时,却发现出口利润被流通环节大幅挤压。

贸易保护主义冲击迫使企业回流国内市场,技术封锁限制了产业升级路径,两者共同强化了国内竞争压力。“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33]。在当代,这体现为部分发达国家采取提高关税、技术出口管制、“友岸外包”等手段。近年来,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明显升级,涉及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领域。其打击范围不仅涵盖制成品,更延伸至供应链上游的中间品。出口受阻的企业被迫转向国内市场,但国内市场可能已经饱和,企业只能展开更加激烈的本土竞争。同时,围绕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链的技术限制措施不断升级,部分发达国家通过提供大规模产业补贴和税收优惠干预资源配置,技术出口管制的范围持续扩大^[34]。出口导向型企业长期按国际采购商要求引进设备。一旦技术供给受限,企业便难以借助技术引进实现差异化突围,被迫锁定在既有技术层级进行同质化竞争。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衔接不畅形成深层次交织效应,使“内卷式”竞争在双重约束下难以破局。一方面,国内产能过剩推动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但流通环节的垄断控制和贸易壁垒严重压缩了出口利润空间,迫使出口产能回流,进一步加剧国内竞争。另一方面,技术封锁限制了企业通过国际技术合作实现产业升级,使企业难以突破既有技术路径。当外部市场受阻、技术获取受限时,企业难以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缓解国内竞争压力^[35]。部分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日益将贸易规则和贸易政策作为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的工具^[36]。这进一步使得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衔接面临重重阻力。在外需收缩和内需竞争加剧的双重作用下,国内市场成为价值实现竞争的主要场域,“内卷式”竞争日趋激烈。简言之,国际环境变化并非“内卷”的直接诱因,而是其通过加剧价值实现困境、压缩结构调整空间,对既有的“内卷”态势产生放大效应。

五、“内卷式”竞争的治理路径: 塑造基于创新能力的竞争优势

“内卷”并非单纯的竞争过度,而是竞争失去引导社会总劳动向创新领域配置的功能后所形成的结果。在此背景下,破局“内卷式”竞争,关键不在于抑制竞争行为或行政性“去产能”,而在于恢复竞争对创新、积累和结构升级的正向激励功能,使竞争重新围绕价值创造而非价值实现展开。为此,针对总量与结构循环、短期与长期叠加、国内与国际交织三重自我强化机制,必须以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三个维度系统施策，为创新型竞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完善的调节机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竞争模式从存量争夺转向增量创造，构建“阶梯状、错位式”的创新型竞争格局，从而有效破解“内卷式”竞争。

（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创新型竞争的物质基础

破解总量与结构循环机制的关键在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扭转社会总劳动在创新领域与非创新领域之间的配置比例失衡。统筹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构建梯度分明、协同共进的产业格局。此举旨在引导社会总劳动在不同技术层级间合理配置，规避盲目跟风引发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从根源上阻断“内卷式”的低水平扩张。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破解产能过剩循环的基础环节。经济史一再证明，“没有健康的制造业，可以说，创新体系会崩溃……‘硬’技术是服务交付的赋能者。”^[37]产业升级的实质并非单纯地替代传统产业，而是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向传统产业扩散，激发传统产业的内生动力，促进传统产业补短板、锻长板、强韧性、提柔性^[38]。加速先进适用技术的扩散、促进设备更新及工艺改造、延伸产业链条，能够有效提高传统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智能车间和工厂，推动工业互联网与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强化绿色低碳转型，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先进产能，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迈进^[38]，以缓解产能扩张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打破技术趋同困境的关键路径。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演进方向。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在于掌控技术创新的战略主动权。构建涵盖“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突破、成果产业化、市场应用”的全流程创新机制，塑造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以国际科技合作为支撑的开放式创新体系，切实保障产业链关键节点的自主性与安全性。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链与安全可靠的供给体系，推动产业结构朝着价值链高端、技术密集型方向演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增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效应，使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而非压低价格获取竞争优势。

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是开拓新增量空间的战略选择。未来产业是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形态，也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关键环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面向未来产业的制度支撑体系。通过完善政策激励、金融支持、风险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机制，营造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生态。正如鲍莫尔^[39]所言：“常规化创新的决策过程及其竞争性后果，同其他任何形式的投资决策过程及其后果几乎没什么区别”。即便是未来产业的培育，也需要遵循基本的投资决策规律。聚焦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六大领域，加快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量子信息、深海空天开发等前沿技术的布局。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加强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推动关键技术实现突破。通过前瞻性地布局未来产业拓展竞争新空间，引导社会总劳动从规模扩张向技术积累转变，从根本上化解产能过剩的困局。

（二）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创新型竞争的调节机制

破解短期与长期叠加机制的关键在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分割，恢复利润率平均化机制，使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和地区间自由流动，引导社会总劳动合理配置，破除“内卷式”竞争中的资源配置锁定效应。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内涵体现为“统一”“大”“强”三个维度^[40]：一是坚持规则一致、制度统一和行动协调，实现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二是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供需互促、产销联动的循环体系；三是聚焦市场功能系统性升级和制度韧性提升，推动竞争秩序强化、分工与规模效益提升、创新效率提升、资源配置优化。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恢复利润率平均化机制的核心举措。土地要素改革的关键是提升配置效率, 加快推进建设用地的市场化流通, 使土地价格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打破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制度刚性, 打破户籍壁垒, 保障劳动力享有平等的社会福利, 促使其在不同部门间快速流动。资本要素重在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减少纵向行政管制和横向地方政府干预, 推动资本在不同部门和地区间自由流动。技术要素的核心在于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重点在于加快推进商品化和市场化步伐。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数据资源登记、交易等标准体系, 健全收益分配制度, 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通。推动要素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 构建全国统一、权责匹配的要素制度框架, 有效解决短期利润率信号失真问题, 为资本按照利润率水平进行市场化配置提供精准导向。

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解决长期资源配置固化问题的关键环节。以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为抓手, 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规范市场监管执法, 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细化公平竞争审查机制与实施流程, 压缩地方保护空间, 针对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促进科技进步、社会公共利益三大豁免条款, 建立更加具体、严格、规范的政策豁免审批机制。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刚性约束^[41], 针对各地以投带引、明投实补、先投后股等产业政策, 加快制定更为有效的审查机制, 持续遏制地方实施产业保护和违规开展企业补贴的行为倾向。规范特殊政策实施, 确保特殊政策的公平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破除市场分割, 使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和地区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和地区, 避免资本被锁定在产能过剩领域。

构建高水平“多链”融合体系是提升市场调节效能的重要支撑。构建高水平的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链、创新链“多链”融合体系, 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内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42]。一方面, 统一产业链基础制度与标准, 制定全国产业链图谱和区域分工指引, 明确各区域优势产业定位与分工。另一方面, 科学引导各类产业向具备比较优势的地区集聚, 完善跨区域转移的利益共享和成本分担机制, 从而规避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统一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与运营规则, 谋划高水平一体化的全国基础设施网络^[43], 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标准, 建立全国统一的智慧供应链数据平台。统一创新链协同与保障体系, 建立全国统一的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平台,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鼓励建设跨区域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通过“多链”融合降低企业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和制度成本, 提升竞争在全国范围内发挥调节作用的可能性, 破解短期利润率信号失真与长期资源配置固化相互叠加的锁定效应。

(三)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拓展创新型竞争的发展空间

破解国内与国际交织机制的关键在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改善国内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 拓展创新型竞争的发展空间, 打破产能过剩与国际市场受阻交织形成的“内卷”困境。当前, 中国正经历从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44]。在过去瞄准国外市场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下, 生产在国内而市场主要在国外, 这种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增长模式弊端显现, 核心技术、市场都受制于外, 产业自主安全可控的风险陡增。主场全球化战略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载体, 整合全球高级生产要素, 着力构建由制度创新、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协同驱动的内生增长路径。该战略旨在实现全方位转型: 在角色定位上, 从规则接受者转向规则制定者; 在动力机制上, 从外生驱动转向内生创新; 在价值链位置上, 从低端锁定转向高端攀升。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突破国际技术封锁的根本路径。为此, 应建立动态更新的关键核心技术清单与分级攻关机制。针对战略攻坚型技术, 由国家统筹组建创新联合体; 针对核心突围型技术, 推行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 针对工艺突破型技术, 构建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技术突破机制; 针对短期替代型技术, 依托专精特新企业实现快速突破。明确链长制企业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出题人”“答题人”的双重角色, 提升企业专家在攻关方向制定中的话语权。支持链长制企业以“揭榜挂帅”的方式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在关键材料、零部件、设备等领域开展协同攻关, 形

成多层次创新主体,培育差异化竞争能力。同时,对技术的引进思路转变为“以技术换技术”,在开放中掌握技术主动权^[45]。完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针对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行业,将市场准入与实质性技术转让、本地研发投入、人才培养挂钩。支持本土企业开展国际技术并购与专利交叉许可,以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主动“走出去”嵌入区域网络是应对贸易壁垒的现实选择。支持重点行业在东盟、中东、拉美等地区建立生产基地,制定制造业“走出去”行动方案,明确新能源汽车、光伏、家电、纺织服装等行业的海外布局路线图。设立“走出去”专项基金,采用“政策性贷款、股权投资、风险补偿”组合模式,支持企业在东盟、中东、拉美等地区新建合作区。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贸易协定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建立RCEP原产地规则利用促进中心,指导企业在RCEP成员国采购中间品并进行生产加工,从而享受关税优惠。推动建立“中国—东盟”双边投资机制,鼓励中国企业与日本、韩国企业在东盟国家开展协同投资,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分工体系。加快传统企业升级,加强与东盟国家产业链垂直分工协作^[46],构建“东部研发设计、中部制造、东盟组装”的分工体系,使国内产能过剩压力通过国际市场得到缓解。

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与本地化是提升产业链韧性的重要保障。深化国际供应链多元化布局与区域协同,制定供应链多元化布局规划建议,引导企业在现有供应链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替代供应商,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成员国中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此举旨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47]。强化区域贸易协定的网络作用,加速推进与潜在关键替代供应国的高标准自贸协定谈判,在具有地缘经济优势、制度环境良好的东盟国家,支持建设海外仓及合作园区。同时,提升国内供应链韧性和本土替代能力,实施供应链本土化提升工程,设立本土供应链培育基金,专项支持关键中间品、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的国产化替代。对受到国外技术封锁、中间品“断供”影响的企业,鼓励其联合国内供应商、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协同攻关。建立供应链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建立国家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预警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时监测全球供应链动态。推进供应链多元化与本地化,既能缓解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又能提升本土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从而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15.
- [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5-12-12(1).
- [3] 黄群慧,叶其楚.中国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J].改革,2025(6):13-27.
- [4] 王海燕,张占斌.“内卷式”竞争:表现、成因及治理[J].改革,2025(3):11-21.
- [5] 刘志彪,王兵.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发生机制与破解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24(12):3-15.
- [6] 郭威,李泽浩.“内卷式”竞争:内涵、成因与治理[J].理论探索,2025(4):95-102.
- [7] 张杰,任元明.中国“内卷式”竞争的主要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破解之道[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2):50-61.
- [8] 曾祥炎,唐小兵.产业反“内卷式”竞争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逻辑与实践机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11):16-28.
- [9] 刘志彪.产业经济学(第3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4:11.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竞争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访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平教授[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0):16-29.
- [12] 汤在新.《资本论》续篇研究: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121.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84.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5.
-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
-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陈鹏飞.马克思经济学的竞争理论及其思想史考察[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2):58-72.
- [20] 赵峰,晏宇翔,李爱军.技术进步、供给需求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解释[J].财经问题研究,2025(2):29-39.
- [21] 陈斌开,索昊.技术革命、新赛道与新质生产力[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2(5):5-16.
-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黄群慧,杨耀武,等.结构变迁、效率变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J].经济研究,2024,59(4):4-23.
- [23] 兰鹏,卓翔宇,张兴祥.“中等技术陷阱”的内涵特征、成因分析与中国跨越路径[J].经济学家,2026(1):108-119.
- [24] 周文.科技创新赋能民营企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J].红旗文稿,2025(7):30-32.
- [2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6.
- [26] 魏旭.唯物史观视阈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J].社会科学战线,2018(4):20-26.
- [27] 刘志彪.“内卷式”竞争的生成机理与综合整治[J].人民论坛,2025(16):38-41.
- [28]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上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以创新穿越周期:2025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分析暨2026走势预测[J].中国经济报告,2025(23):5-10.
- [29] 朱安东,张宏博.科学认识当前我国产能过剩[J].上海经济研究,2023(12):25-36.
- [30] 倪君.国家创新能力视角下深化市场化改革的着力点[J].宏观经济管理,2024(11):38-44.
- [31] 刘志彪.“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指引”的探索性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3):32-41.
- [32] 徐骥,彭继增,彭桃强.行政垄断规制、制度环境与地区经济差距[J].当代财经,2025(12):45-60.
- [3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6.
- [34] 孙明松,胡慧,黄建忠.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产业贸易政策调整及中国应对策略[J].南方经济,2025(12):47-60.
- [35] 周文,冯文韬.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基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动态,2021(4):27-37.
- [36] 张哲.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何以安全化?[J].国际展望,2026,18(1):106-129.
- [37] 威廉姆·邦维尔安,彼得·辛格.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M].沈开艳,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406.
- [38] 周文,白佳.新质生产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机理、重点方向与战略路径研究[J].齐鲁学刊,2025(6):101-114.
- [39] 威廉·鲍莫尔.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M].郭梅军,唐宇,彭敬,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22.
- [40] 刘志彪.新发展格局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分析框架、内在逻辑与政策重点[J].经济研究,2025,60(5):20-36.
- [41] 周文.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136.
- [42] 周文,钟锦宸.现代化西方叙事与中国式现代化突围——基于国家建构的经济学再审视[J].上海经济研究,2025(6):5-17.
- [43] 蔡之兵.加快形成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闭环:内在机理与系统路径[J].经济学家,2026(1):89-98.
- [44] 刘志彪,刘雅珍.建设超大规模市场、实施高水平开放与发展新质生产力[J].社会科学,2025(8):104-114.
- [45] 詹晓宁,齐凡,吴琦琦.百年变局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趋势与政策展望[J].国际经济评论,2024(2):71-94.
- [46] 廖萌,尹佳音.新发展格局下优化我国境外投资区域布局[J].宏观经济管理,2024(6):74-82.
- [47] 周文.强国经济学——中国理论与当代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324.

The Causes, Operating Mechanisms, and Governance Pathways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of Competition

ZHOU Wen¹, ZHONG Jinchen^{1, 2}

(1. Institute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Competition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operating mechanism of a market economy.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has become a prominent problem in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operation, manifested in the continuous intensification of market competition among firms without effectively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r efficiency improve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of competition. It argues that competi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socialized large-scale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regulating the allocation of total social labor among different sectors of production. Competition possesses a dual nature, both promoting and constraining productive forces, and undergoes a stage-specific transformation from value creation to value realization across different phas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represent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n which competition shifts from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o constraining their further advance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hree causes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First, stage-specific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constrain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Second, the endogenous weakening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gives rise to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Third, impediments to capital mobility lead to the malfunctioning of the profit-rate equalization mechanism.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becomes self-reinforcing through three mechanisms: a quantitative-structural circulation mechanism, in which capacity expansion, profit compression, weakened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form a closed loop; a short-term and long-term overlay mechanism, whereby factor-price distortions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interact to continuously obstruct profit-rate equalization; and a domestic-international interlocking mechanism, in which trade barriers and technological blockades force production capacity to return inward, further intensifying domestic competitive pressure.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a governance pathway centered on cultivating innovation-base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forming a “tiered and differentiated” pattern of innovation-oriented competition. This pathway encompasses three dimensions. It should build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t should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t should expand high-level opening-up.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situating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with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revealing its essence as a stage-specific transformation of competition from value creation to value realization.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omprehensively addressing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of competi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value realization

(责任编辑: 孙 艳)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6.03.001

[引用格式]周文,钟锦宸.“内卷式”竞争的成因、运行机制与治理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竞争理论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26(3):3-16.